

一艘宋代沉船的千年“船”奇

——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,揭秘古时海上“黑科技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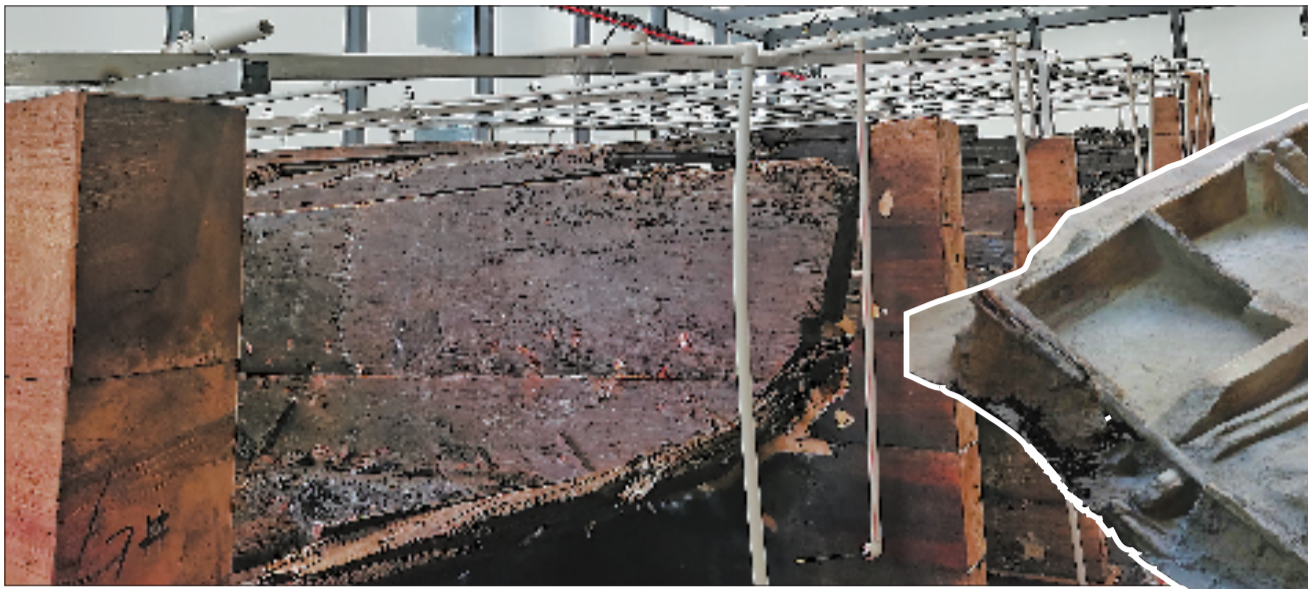
■ 本报记者 应忠彭

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的遗址展示馆里,一艘按原尺寸复原的宋代古船静卧在沙盘之上。船身黝黑,龙骨嶙峋,仿佛刚从历史中被打捞上来,引得游人驻足观看。

而就在离遗址公园不远的江心屿上,一艘真正的宋代沉船正在“文物ICU”里接受漫长的“康复治疗”——立体喷淋系统每隔两小时喷洒水雾,维持着船体木材的含水率,防止木材脱水、开裂。

这艘沉船残长15.9米,残宽4.26米,最大舱壁深度2.2米。2022年,它在朔门古港遗址的7号码头外侧江底被发现,被命名为2号沉船。

900多年前的2号沉船就像一把钥匙,打开的不仅是一段近千年的“船”奇,更见证了那些随船远航的人间烟火。



“文物ICU”中的2号沉船。



温州朔门古港遗址2号船数字化模型。通讯员 黄加量 摄

名字刻在器物上,透出一种文化和技术自信。

明弘治《温州府志》评价:“温之漆器名天下,其初精致之甚,奇彩异制,夺目光焰。”温州本土并不产漆,唯有在工艺上精益求精,才能获得更高收益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2号沉船舱底的沉积物中,复旦大学少卿团队还检测到了山药的DNA。而这种山药,极可能就是温州文成的“糯米山药”——其栽培历史可追溯至宋代。明代刘伯温辑录的《多能鄙事》中详细记载了它的栽培方法:“先掘一沟,长丈,阔三尺,深四尺,砖铺其底,以粪土填满,水实定,插山药芦头……”900多年后船舱里检测出的山药DNA,与明代农书和地方文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这山药,可能是远航海员赖以果腹的粮储,也可能是温州准备外销的特色商品。无论是哪一种,都描摹了那段历史的另一个侧面。

考古人员还在古港遗址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食物标本。“我们发现了大量贝类,都是当时温州人喜欢吃的,还发现了荔枝、橄榄、桃的果核。”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伍显军说,“加上发掘的建筑遗址、茶盏、酒瓶等,可以想象那码头边可能有人正在喝茶或喝酒,画面感很强。”北宋中晚期,酒肆文化兴盛,人们喜欢坐在码头边,吃着刚捞上来的海鲜,也印证了温州人延续至今的味觉偏好。

千年前的温州人,已经掌握了劈波斩浪的造船技艺,将青瓷、漆器、山药乃至自己的生活,一起装进船舱,驶向远方。

千年后的今天,江心屿双塔仍守望着瓯江。那座庞大的郭公山船场已淹没在江浪之中,但滩涂上曾回荡过锤声的每一寸泥土,仍旧守望江流。



六角瓣形的朱漆盒。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

禹船屯”(今广州)并称为东吴三大造船基地。

朔门古港遗址不远处,就是温州郭公山。历史记载,宋代温州造船业发达,温州官营造船场每年造船额居全国前列,最大的官营造船场就设在郭公山下。那时候温州船场能照着“船样”(图纸)成批造船,连远在北方黄河边的澧州(今河南濮阳)需要40多艘架浮桥的船,也千里迢迢派人来温州订造。

到了元朝,温州与扬州、杭州、明州、泉州、广州等地既是著名的港口,又是船舶的主要建造地。北宋名臣赵抃“城脚千家具舟楫”的诗句,就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繁忙景象。

山药里藏着人间烟火

2号沉船,只是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里发掘出来的重要“宝贝”之一。目前,古港遗址在考古工作中已发现12座码头、2艘沉船及古城水陆城门等丰富遗迹,已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、漆器、钱币等遗存。专家认为,这是国内外罕见的“全要素”古代港口遗址,填补了海丝申遗港口类遗存的关键空白。

古港遗址中还发掘出一件六角瓣形

么办?此时就需要宋代的“防水密封胶”——脰料大显身手。

这种脰料由桐油、石灰、麻纤维三种材料按比例混合捶打而成,看起来就像一层薄薄的“泥巴”。它嵌在每一道木板拼缝里,包裹着每一颗铁钉,经过千年的江水浸泡、泥沙冲刷也没有脱落,使得水密隔舱真正“水密”。

宋代以后,这样的技术被普遍采用。研究发现,福建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古船夹缝里就填塞由麻丝、竹茹、桐油灰捣合而成的脰料,并用铁钉钉合,大大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,增加了远航的安全性。而同一时期的欧洲航海者还在用裹油的树皮和棕丝塞缝。

13世纪末,马可·波罗来到中国。他登上那些十几舱的大船,亲眼目睹了水密隔舱的奇妙之处,然后在游记中写下:“很多大型船舶有船舱13个,用厚木板隔开来,用于防范海险,船身触礁或撞到大型鱼类等导致海水透入的情形……”18世纪末,英国海军总工程师塞缪尔·本瑟姆受命设计新型军舰,他提起自己采用的技术时说“正如现在

中国人做的一样”。

造船场里的温“舟”往事

可以说,水密隔舱这种“黑科技”是古人远航的“安全密码”,它是中国对世界航海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。2010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“中国水密隔舱船舶制造技艺”列入《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》。

有意思的是,在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梁岩华看来,2号沉船从形状结构上有明显的地域特性,很可能为温州本地造船场建造。这个推断还与一幅画有关:元代永嘉(今浙江温州)画家王振鹏在《江山胜览图》中描绘了温州港口的繁荣景象,其中不少船只与2号沉船特征一致,如船形狭长、船尾起翘明显、甲板边缘处有一排泄水孔等等。

事实上,温州使用舟船的历史悠久,造船技艺也十分精湛。

汉代,温州已能制造扁舟、轻舟及楼船(古代战船)等。三国时期,孙权在罗阳县境内(今平阳仙口)设官营“横屿船屯”,委派典船校尉,监督罪徒造船。“横屿船屯”与“温麻船屯”(今福州)、“番

宋代“防水密封胶”

在没有电焊、没有现代密封胶的年代,古人是怎么把一块块木头拼成大船,还能在风浪里跑得稳稳当当的?答案就藏在龙骨、水密隔舱和脰料里。

龙骨是船体的脊梁,从船首贯穿至船尾,像人的脊椎一样支撑起整个船身。2号沉船的船壳板上,一道道鱼鳞状的搭接痕迹层层叠压,铁钉斜斜地楔入木缝。这种结构不但提高了龙骨的强度,还让船壳外表形成纵向锯齿,增大了船舶横摇时的阻力,使船在风浪中不容易倾覆。

2号沉船的船舱内壁上横贯着7道隔板,每一道隔板都将舱体分割成独立的小房间。“这叫水密隔舱。”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保护部的陈微微解释道,即便某一个舱室在航行中进水,水也只会被困在那个隔间里,其他舱室依然可保持密闭、保有浮力。

拼装好的隔舱板仍有许多缝隙怎



俯瞰温州朔门古港遗址。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

兰亭、金庭、苕萝山,在文献记载中寻觅王羲之 书圣真身墓葬何处

■ 陈侃章

《兰亭序》是中华文化瑰宝,其影响力无与伦比;嵇山金庭是王羲之归隐处,也是王氏后裔重要聚居地,这些早为世人熟知。与之相较,王羲之墓葬诸暨苕萝山,却长期沉寂史海,知者寥寥,不少人分不清真身墓与后世纪念馆的区别。

历史事实十分明确:王羲之墓葬苕萝山的记载,在王羲之去世数十年后就见诸文献,是当时人的当代记录,记载链条系统完整,代代不绝,相较于《兰亭序》完整文本,“金庭归隐”记载,不仅时间更早,文献基础也更为坚实。

个字的《临河叙》。这段文字记述了兰亭雅集的时间、地点、景致、参与人员和罚酒规则,为后世《兰亭序》定本奠定了基础。

第三阶段:324个字的《兰亭序》完整面世。时隔130年左右,至唐贞观二十二年(648),房玄龄等奉敕所修《晋书》完成,此书记录了324字《兰亭序》定本文本。

概而言之:25个字的《兰亭集序》记载约在440年,153个字的《临河叙》约在510年,324字的《兰亭序》约在648年,《兰亭序》的完整面貌历经200多年才与社会见面。1965年讨论《兰亭序》真伪时,郭沫若也曾指出文本演变周期过长,就是一大疑点。

再说世人最为推崇的《兰亭序》书法墨迹,自东晋永和九年(353)书成后,一直由王羲之之后人秘藏,未曾公开。直至唐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书法,在唐贞观初(630年左右)设法将《兰亭序》入藏长安内府,并公开展示多种临摹本,而此时距王羲之去世已有200多年。

真身墓还是纪念馆

王羲之归隐金庭的记载在唐中晚期出现。现存王羲之的600多份书札中,也没有见到“金庭”二字。文献明确记载最早为裴通《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》,文中称:“琅琊王羲之领右将军家于此山……于此山置金庭观,正当右军之家。”裴通在文中写到唐元和二年(807)游此,则他比王羲之晚450年左右。

学界公认,记载王羲之事迹最完备的是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,但本传中并未提及王羲之归隐时间、地点和墓葬,仅记在会稽一带有居所。官修《嘉泰会稽志》未有王羲之归隐金庭之事,包括稍后官修《刻录》也未直接提到。王羲之在东晋升平五年(361)去世,王羲之隐居刻之金庭,实是后世追叙。上海师范大学嵇山



左图:南宋王十朋《会稽三赋》卷首(1169年左右)诸暨苕萝山及绍兴府地图。右图:唐裴通《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》(835年左右)(清乾隆《绍兴府志》卷之六)。陈侃章供图

籍学者许超雄发表的《王羲之归隐刻金庭的历史追叙》学术文章,对此多有灼见。

嵇山最早有“王右军墓”记载,见于南宋嘉定七年(1214)高似孙《刻录》。此时距王羲之去世850多年了,业界认为这非真身墓,而是后世纪念馆。又据《嘉泰会稽志》《刻录》记载,孝嘉乡与金庭乡为当时嵇山境内并存的两个乡,并无拆分或合并关系。孝嘉乡直到20世纪末叶才撤销。那么,金庭王右军墓地与《刻录》所记地点为什么不相一致呢?

另需辨析隋代尚果《瀑布山展墓记》。该文首见于康熙三十七年(1698)所编《金庭王氏族谱》,说是吴兴永欣寺沙门尚果隋大业七年(611)所作。此前记录王羲之遗迹的唐《艺文类聚》《全唐文》,两宋《会稽掇英总集》《会稽三赋》、嘉泰《会稽志》《刻录》等史册地志,都没有此文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、唐《金庭观晋

右军书楼墨池记》、唐王师乾《王右军祠堂碑》、宋汪应辰《金庭王氏族谱序》等金庭王氏族谱资料,也从未提及有尚果《瀑布山展墓记》文。也就是说,唐宋时期关于王羲之遗迹诗文的所有史书地志及王氏族谱中,都没有尚果此文存在。

尚果其人亦无从查考。康熙《金庭王氏族谱》是这一隋朝文献之源,这是一千多年后始出现的孤证,其时距王羲之去世(361年)已1300多年。考证中对文献的真实性、参证性非常重要。类似情况还在延续,即王羲之死后葬于山阴兰亭,但这位名士的墓葬也随历史风尘湮没,再也找不到其墓所在。

被湮没的苕萝山

王羲之墓葬诸暨苕萝山,最早载于南朝宋会稽太守孔晔(又名孔灵符)所纂

修《会稽记》。原书虽已散佚,但相关记载被北宋《太平御览》、南宋《嘉泰会稽志》及鲁迅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等多书辑录征引,如北宋《太平御览》卷四十七引述《会稽记》:诸暨县苕萝山,“王羲之墓在山足,有石碑,孙兴公为文,王子敬所书也”。如南宋《嘉泰会稽志》卷第六:“王羲之墓,在诸暨县苕萝山。孔晔《记》云:墓碑孙兴公文,王子敬书也。而碑亡矣。”文献记载完整可靠,还根据不同时期的墓体变化情况,作了细微调整。

不难明白,王羲之墓葬诸暨苕萝山脚,由当时文豪孙绰撰写碑文,由大书法家王献之的孙,墓址地点、墓体形制,细节清晰。《晋书·孙绰传》载王氏人物去世,必由孙绰撰碑文,这又是一个佐证。孙比王去世晚十年,二人相知相契,是好友加同僚。

孔灵符《会稽记》成书约在440年,距王羲之去世仅数十年时间。孔灵符作为会稽郡最高行政长官,若非亲见,不可能作如此细节记述。自南朝以后,官修北宋《太平御览》、南宋《嘉泰会稽志》(在卷六、卷九两次记述),明代弘治、万历《绍兴府志》及《苕萝山志》,清代雍正《浙江通志》、康熙、乾隆、光绪《诸暨县志》都有记述,文献绵延1600年从未中断,各层级的官修史志都有记载。但至清朝乾隆年间,王羲之实体墓在苕萝山已找寻不到,这当中自然湮没的可能性很大,例如王羲之修禊的兰亭场所,到了元末,也是石壁断裂,青苔磨蚀,荒凉破败,不见原貌。这种凄凉景象,王冕《过兰亭有感》诗中作了充分描述。类似情况还在延续,即王羲之死后葬于山阴兰亭,但这位名士的墓葬也随历史风尘湮没,再也找不到其墓所在。

孔灵符《会稽记》成书约在440年,距王羲之去世仅数十年时间。孔灵符作为会稽郡最高行政长官,若非亲见,不可能作如此细节记述。自南朝以后,官修北宋《太平御览》、南宋《嘉泰会稽志》(在卷六、卷九两次记述),明代弘治、万历《绍兴府志》及《苕萝山志》,清代雍正《浙江通志》、康熙、乾隆、光绪《诸暨县志》都有记述,文献绵延1600年从未中断,各层级的官修史志都有记载。但至清朝乾隆年间,王羲之实体墓在苕萝山已找寻不到,这当中自然湮没的可能性很大,例如王羲之修禊的兰亭场所,到了元末,也是石壁断裂,青苔磨蚀,荒凉破败,不见原貌。这种凄凉景象,王冕《过兰亭有感》诗中作了充分描述。类似情况还在延续,即王羲之死后葬于山阴兰亭,但这位名士的墓葬也随历史风尘湮没,再也找不到其墓所在。

历史原貌的记录

从记载时序看:诸暨苕萝山王羲之墓葬记载约在440年,与《兰亭集序》最早25字记载时间基本一致;而153字

《临河叙》要晚约70年,324字完整《兰亭序》要晚200余年;“金庭归隐”记载要晚近400年,嵇山孝嘉乡王右军墓记载要晚800年。

从记载作者看:《兰亭序》相关记载分别为刘义庆、刘孝标、房玄龄等文士与官员;“金庭归隐”始记作者裴通身份不详;苕萝山墓葬记载为时任会稽太守孔灵符,具备实地考察、亲历记录的条件,权威性更高。

从记载体裁看:《兰亭序》早期出自文学笔记,定本出自正史;“金庭归隐”相关记载为后世游记、方志与族谱;苕萝山墓葬始载于南朝当地当时最高官员所纂修的乡邦志书,又被全国性类书与历代官修方志持续收录,史料层级高、传承稳定。

通过梳理王羲之相关核心文献的时序与性质,就不难作出判断:王羲之葬于诸暨苕萝山的记载,形成时间最早、来源最为原始、传承最为连贯,是历史原貌的记录。长期以来,由于受《兰亭序》巨大文化影响和“金庭归隐”的叠加,王羲之墓葬苕萝山的历史渐被遮蔽,乃至不少人已完全不知此事。现今厘清文献记载,不只限于考证,还有助于正本清源,拨开迷雾——兰亭、金庭、苕萝山都有王羲之的重要行迹,可为王羲之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史料支撑。

行文至此,突然闪过《三国演义》电视剧片尾歌词:“湮没了黄尘古道,荒芜了烽火边城。岁月啊!你带不走那一串熟悉的姓名。”其实文献的重要记载、重大史实,如果不去发掘弘扬传播,完全可能被岁月带走湮没,因为人们不一定清楚历史天空中飘过怎样的风云雷电,也不一定清楚历史场域中,到底诞生和闪烁着几颗“恒星”。

(作者系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学生,曾出版《飞将军蒋鼎文》《古往今来说西施》《冬季里的春闺——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》等著作。)